

新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 消费者劳动价值论

唐文进

摘要: 在新经济时代, 劳动价值论必须有新的发展。新经济是指以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的经济, 新经济时代对劳动价值论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已有的价值理论或相关思想无法做到既令人信服地解释这些问题, 又能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整性。而消费者劳动价值论则不仅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本意, 而且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 它能够在遵循马克思原意的情况下较好地回答上述新问题。

关键词: 新经济时代 消费者劳动价值论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简单劳动节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必须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 换句话说, 劳动价值理论必须有新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仅必须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整性, 而且必须能够圆满地回答新经济时代对劳动价值理论所提出的新问题。

一、新经济时代对劳动价值论提出的新问题

所谓新经济就是指以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的经济。最早提出“新经济”概念的美国《商业周刊》1997年第17号明确指出:“谈‘新经济’时, 我们的意思是指这几年已经出现的两种趋势。第一种趋势是经济全球化, 第二种趋势是信息技术革命。”新经济发端于美国, 而且在美国已经成为事实。而2000年以来, 新经济浪潮开始席卷整个世界, 使得劳动价值论面临的挑战变得空前严峻起来。

1. 经济全球化要求劳动价值论能够说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 就我国而言, 尤其要能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经济全球化是指各国经济活动从国内走向全球, 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社会化的过程。许多研究表明, 在现阶段, 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全球经济的市场化即市场的边界从国界走向全球。市场机制的跨国界延伸形成一体化的世界市场, 地域界限和国家界限被不断打破, 这一动态的市场扩张过程最终形成统一的全球经济。可见,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全球经济的市场化。事实上, 市场机制的重新发现不仅是美国新经济形成的重要原因,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帮助许多传统计划体制国家的经济发展走出前所未有的困境, 而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因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而大大加速了我国的经济的发展。

但是,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传统的劳动价值论, 或者更确切地说, 是劳动价值论的传统解释同现实经济生活严重脱节。这种脱节已经引发了许多学者对劳动价值论本身的怀疑和批评。例如, 针对我国由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转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在分配制度上实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现状, 有的学者提出, 按劳分配是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的。现在既然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 鼓励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 这就表

明, 认为只有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 与现实不相符了。它不能说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根据。实行按要素分配, 就得承认各种生产要素都参与价值的创造。有的学者宣称:“劳动价值论的坚持, 还导致了我们的经济学基本理论同现实经济生活的严重脱节, 一个影响最大的事实就是难以说明价格的决定和变动规律, 而这个规律对于市场经济体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事实上, 马克思建立劳动价值论的分析前提, 和亚当·斯密及李嘉图没有什么两样, 都是实物交换, 这就必然留下一个如何以它来分析非实物交换的法则的问题。马克思既然不肯离开劳动价值论一步, 也不愿为供求理论作任何的让步, 结果势必遇到同现实生活相冲突的难题。从这个角度来讲,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没有摆脱古典派价值论的局限性, 因而也就不能以之解释实物交换以后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 如果硬要坚持这样做, 结果必然是理论的破产和对实际经济生活的曲解。”总之, 经济全球化或者说全球经济的市场化要求劳动价值论至少必须回答这样几个问题: (1) 按要素分配是否背离了劳动价值论? (2) 如何用劳动价值论来分析非实物交换? 或者说, 非物质生产部门如服务行业的劳动是否创造价值? (3) 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 非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不断提高, 其作用日益显著。在此背景下, 是否承认私营业主的劳动, 又如何衡量私营业主的劳动力价值?

2. 信息技术革命的推进要求劳动价值论必须就一系列新出现的问题进行回答。按照经合组织(OECD)的理解, 新经济被看成信息技术、因特网与知识创新的结合。其中, 信息技术是基础, 知识创新是驱动力, 因特网是基本生产工具。换言之, 新经济被看成是知识经济、网络经济和信息经济的综合。知识经济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 亦即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其基本特征是: (1) 科学与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日益成为知识经济的基础。(2) 信息和通讯技术在知识的发展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3) 人力的素质和技能成为知识经济实现的先决条件。(4) 服务业在知识经济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也就是说, 产品越来越趋于无形化。显然, 上述概括也从一个侧

面反映出了网络经济或信息经济的基本特征。事实上,信息技术革命作为新经济的动力源,不仅已经促成了美国新经济的出现,而且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推动着世界各国现实经济生活的深刻变革,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电子商务的兴起。

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传统的劳动价值论或者说劳动价值论的传统解释已经无法令人满意地回答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例如:科技工作者是否创造价值?知识包括信息是否具有价值?网络是否具有价值?如果具有价值,那么其价值量又如何衡量?尤其是劳动力的价值或者说人力资源的价值如何衡量?为什么会产生电子商务?货币为什么会电子化乃至数字化?等等。

为了解释新出现的这些问题,理论界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归纳起来,这方面的主要观点大致有以下几种:

(1)多生产力要素说。我国学者乌家培认为,新经济或知识经济的出现,是由于知识、信息、技术、教育等已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素,并作用于原有的生产力三要素上,使之能力不断扩大和效益不断提高:首先使劳动力对其信息能力的依赖空前增强;其次使劳动工具网络化、智能化以及隐含在其内的信息与知识的份量急剧增大;再次使劳动对象能得到更好的利用并扩大了其涵盖的范围。此外,还使科学技术、教育和管理对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更加强化,从而使作为生产力特殊软要素的信息与知识,通过对生产力其他要素所起的重大影响,发挥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两个过程相互结合的特殊作用。

(2)知识作为新生产要素独立创造价值说。德国学者乌尔里希·克洛茨认为,在信息经济中,价值增加更多地是通过知识而不是工作来实现。这种价值创造过程不是通过总额的增长而是通过知识的运用实现增值。世界范围的电脑联网使数字化符号与其物质载体的分离成为可能,从而可以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以数据流取代产品流通。在这种“由原子到比特”的转移过程中,迄今为止的生产将演变成服务,工业劳动将演变成信息劳动。非物质的成分和价值(信息、服务、关系和情感)在价值创造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我国学者谢平也著文指出,美国经济学家罗默创立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知识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内生变量列入增长模式,知识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最重要动力。

(3)知识资本说。我国学者汪丁丁认为,通常所谓的“知识经济”,就是指经济的主要产品的主要成本含量从古典的资本与劳动投入转移为“知识性”的投入。当培养劳动力所需要的教育投入的价值增加到超过该劳动力简单再生产所需要的日常消费投入的价值时,该“劳动”就从古典的“劳动”要素演变为“后工业社会”的知识资本。一旦以劳动者为载体的知识成为牟利的资本,劳动就开始转化为“人力资本”。也就是说,投资人以劳动者的知识积累过程(例如正规学校教育、在职培训、自修)为投资目标,期待着将来从这一知识存量中获得大于投资额的回报。

(4)软劳动创造价值说。我国学者晏良剑从劳动价值论角度提出了知识可以创造价值的观点,认为一切劳动不管形式和内容如何,都是意识支配下的物质运动,是人的脑力(软要素)和体力(硬要素)的使用、发挥或耗费。人脑所特有的意识活动,具有自身独特的与物质运动不同的行进方式和运动

规律,人脑的特殊功能以软要素形态转换方式通过支配劳动者的器官和劳动工具,在劳动过程中再生产价值和再创造使用价值。人类创造价值的劳动始终是软劳动和硬劳动的相互交织,只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劳动的效率不同而已。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出现软劳动和硬劳动在时间和空间上产生分离,从而使软劳动被相对“独立”出来,直至与硬劳动相对立。

(5)脑力劳动创造价值说。我国学者李罗力认为,上述四种观点虽然都试图从经济活动的本质内涵来观察和解释新经济,但是它们又都有各自的理论局限性和片面性。在他看来,新经济本质上仍然是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一种经济活动,它仍然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部的生产过程,只不过它是代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具有根本变化特征的新的物质生产过程,它是原有物质生产过程从量变到质变的一次新飞跃。经济学家们要从现代经济活动的本源即价值创造和价值生产的过程来考察新经济。对新经济价值创造和价值生产的考察应当从人类的劳动创造这个最基本点出发。他敏锐地观察到,人类从以体力劳动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历史发展阶段进入了以脑力劳动为代表的知识经济或新经济历史发展阶段;因此,他重新强调了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观点:承认脑力劳动同样也在创造价值。

二、新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消费者劳动价值论

1. 已有的价值理论或相关思想无法做到既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又能够令人信服地解释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已有的价值理论或相关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彻底否定劳动价值论,这包括西方现有的种种价值理论,如生产费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均衡价格论等等,当然也包括国内某些学者试图彻底甩掉劳动价值论这一“包袱”的论调。另一类则是在肯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作些修补、重新解释或发展。这一类主要又包括三种思路:一种是在“劳动”的概念上作文章,由此提出了活劳动与物化劳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软劳动与硬劳动、物质生产劳动与非物质生产劳动等一系列相互对立的概念,引发了关于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非物质生产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等问题的大讨论,出现了所谓的“社会劳动价值论”。一种是在引入新的价值决定因素方面下功夫,如前文提到的多生产力要素说、知识独立创造价值说、知识资本说等,就试图通过不断引入新的因素作为价值决定要素来解释新出现的问题。还有一种则试图将传统的劳动价值论与西方现有的种种价值理论综合起来以便做到两全齐美:既不损害前者,又能利用后者说明许多新出现的问题。这种综合往往选择使用价值及其度量作为切入点引入西方理论。

很明显,第一类价值理论或相关思想不可能是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这一点已经为理论界和实际部门所公认。至于第二类的后两种思路也往往难以摆脱背离劳动价值论的嫌疑:如果除劳动以外的其他因素,不管这种因素有多新,可以决定价值的话,那么马克思关于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论断岂不成了一纸空文?而引入西方种种价值理论虽然可以解释不少新问题,但是引入者未能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是:西方种种价值理论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之间所固有的矛盾如何克服?更有意思的是第二类的前一种思路,学者们绞尽脑汁、引经据典的争论最后的结果要么毫无必要,要么徒劳

无功:关于非物质生产劳动创造价值的命题显然是根本不需要争论的;而关于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的争论至今仍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而且更致命的是:争来争去谁也没有解决不同种劳动如何换算的问题。对此,有学者批评道:“……人们怎么可能仅仅依据那个所谓唯一的共通物(抽象劳动)来交换,而不顾及其他的各种条件和要素呢?更何况关于不同种的劳动如何换算的问题(他牵扯到抽象劳动的计算)至今还没有从理论上得到解决,更不消说仅仅以它作为交换的依据了。”⁴⁰

2. 消费者劳动价值论及其对新经济时代的新问题的解释。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已有的价值理论或相关思想之所以在面对新经济时代的现实时显得苍白无力,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背离了劳动价值论,或者没有解决好劳动价值论与西方种种价值理论之间所固有的矛盾;二是未能解决好价值衡量问题,或者说不同种劳动的换算问题。

在我看来,上述尴尬局面的出现,其根源还在于他们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未能跳出生产者劳动价值论的框框,即认为商品的价值由该商品生产者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受此限制,他们很难理解在某些新要素对商品生产的作用越来越大的新时代,人们怎么能够只强调劳动的作用而对其他要素的作用视而不见。为此,有的学者提出了诸如知识价值论之类的种种价值理论,有的学者则写道:“是否只有劳动,而且是抽象掉了具体形式的劳动,即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体力和脑力的支出的劳动,才是交换价值的源泉,而其他要素都不可能充当这个角色呢?不见得。事实上,包括土地、劳动、资本和企业经营在内的各种生产和经济要素,甚至其他一些非经济的要素,都有这种可能,也都有这种资格。”⁴¹

其实,生产者劳动价值论完全是后人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误解。众所周知,劳动价值论的根本论点就是认为商品之所以具有价值是因为包含了人类的劳动,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⁴²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马克思并没有提到究竟是谁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后来的学者很自然地把它看成是生产者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进而渐渐地走进了生产者劳动价值论的死胡同。事实上,马克思本人却早已觉察到这一陷阱并在《资本论》第3卷中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他写道:“尽管每一物品或每一量某种商品都只包含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并且从这方面来看,所有这种商品的市场价值也只代表必要劳动,但是,如果某种商品的产量超过了当时社会的需要,社会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就浪费掉了,这时,这个商品量在市场上代表的社会劳动量就比它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小得多。(只有在生产受到社会实际的预定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因此,这些商品必然要低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其中一部分甚至会根本卖不出去。如果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劳动的数量,同要由这种产品来满足的特殊的、社会需要的规模相比太小,结果就会相反。”⁴³可见,马克思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进一步规定,“是说决定价值的劳动,不仅就生产方面的条件来说,应当是社会必要的(劳

动强度、劳动熟练程度、平均生产条件),而且,这种劳动还必须符合社会的需求。”⁴⁴也就是说,马克思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理解是符合社会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由于社会需要最终是由消费者而不是由生产者来决定的,所以符合社会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必然是消费者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观点与马克思一再强调过的“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其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价值是一个历史范畴而非永恒范畴”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更何况,如果承认了生产者劳动价值论,那就等于承认了一个荒谬的命题:卖不出去的商品也具有价值,因为生产者为生产该商品耗费了劳动时间。上述分析有力地证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非生产者劳动价值论,而是消费者劳动价值论,即商品的价值量由消费者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不仅如此,时代的发展也强烈呼唤着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从生产者劳动价值论到消费者劳动价值论的转变。在短缺时代,由于社会产品远未达到极大丰富,所以根本不存在生产出来但卖不出去的商品,因而生产者劳动价值论仍有存在的合理空间。而在新经济时代,短缺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更常见的问题是过剩,换言之,卖方经济已经转变为买方经济。“消费者就是上帝”的口号响亮地喊出了消费者地位的转变。人们普遍认识到市场经济就是消费者主权经济,而新经济则更是消费者经济。有学者写道:“我对新经济的定义是消费者经济。”农业经济是自产自销,工业经济是市场经济,做好了,拿到市场去销,那你要买东西就到市场来买。市场经济是旧经济,要去猜这个产品可能有很多人要买,然后才去做,如果没人要,就只好减价卖掉。新经济就是有网络以后,变成消费者经济。你直接知道消费者要什么,你再去做,将来的市场就是工厂可以将产品直接卖到最终的消费者,根据顾客的需要来生产,直接满足他们的需要。”⁴⁵因此,生产者劳动价值论已经不可能无视卖不出去的商品的存在,再加上它难以解释面临的新问题,所以也就越来越失去存在的合理性,取而代之的必然是消费者劳动价值论。

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如果消费者劳动价值论得以成立,那么又如何衡量消费者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我认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消费者因为消费某种商品而节省的简单劳动来衡量。换句话说,按照消费者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消费者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后者又以消费者因为消费商品而节省的简单劳动来衡量。

至此,许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首先,按要素分配并未背离消费者劳动价值论,因为要素的使用节省了简单劳动,从而应该得到补偿。具体地说,如果没有这些要素的使用,创造相同的使用价值就需要付出更多倍的简单劳动。其次,非物质生产部门,如服务行业的劳动同样具有价值,因为服务的享用者即消费者同样因为享用服务而节省了简单劳动。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服务劳动,消费者将不得不付出更多的简单劳动。第三,必须承认私营业主的劳动,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组织和管理,生产相同的产量将需要投入更多的简单劳动。至于私营业主的劳动力价值,乃至所有的劳动力价值都可以这样来衡量:在把该劳动力从劳动的过程中抽出来以后需要增加多少简单劳动才能维持产出不变,也就是说,该劳动力的使用究竟节省了多少简单劳动。第四,科(下转第55页)

支自然资源尤其是环境资源的基础之上的, 仅仅因为环境恶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损害尚未计入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账户就忽视它的存在, 这种认识不仅有害, 而且已经过时了, 因而需要重新认识 GNP, 并将国民经济核算账户转化为“绿色国民账户”; 五是在自然资源价值观念更新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 增强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如改变“有水快流”式的资源开发利用方式, 实行“细水长流”式的资源开发利用方式, 增强资源开发利用的“时间偏好”和“代际公平”观念; 克服国有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的“机会主义”、“搭便车”、“利益均沾”、“争抢”等观念及行为; 强化人们对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的“内省”意识, 提高人们对资源破坏、资源危机认识的判断标准; 增强自然资源的法制观念, 加强自然资源法、环境法的司法; 在社会公众中普遍倡导以“5R”(Reduce(节约资源)、Revaluation(绿色选购)、Reuse(重复使用)、Recycle(回收利用)、Rescue Wildlife(保护野生动植物))为特征的有利于资源环境的生活方式, 使保护资源与环境成为人们可以广泛参与的行为和时尚, 由此推动我国的绿色技术、清洁生产、绿色消费以及环保政策法规的完善和实施。通过自然资源价值理论创新与自然资源价值观念更新, 逐步形成自然资源开发管理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及意识形态等新规则, 增强非正式制度的约束, 使经过重新安排和创新的非正式的自然资源开发管理制度与正式的自然资源开发管理制度共同成为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动力。

综上所述, 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价值

论, 其现实意义主要表现为: 它是实现资源资产化管理,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理论基础; 是促进资源产业发展的理论依据; 是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根据; 是增强和加深对劳动价值论认识的重要途径; 它是促进人们关于资源价值观念转变的重要动力。正因为如此, 经济理论界有必要进一步加深对自然资源价值论的研究, 以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注释:

李金昌、仲伟志主编:《资源产业论》, 34 页,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1; 钱阔、陈绍志主编:《自然资源资产化管理——可持续发展的理想选择》, 91 页,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6。

10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 第 23 卷, 121、120~121、56~57、57、272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 第 25 卷, 74、702、158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王军:《可持续发展》, 139 页,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7。

13 钱阔、陈绍志:《自然资源资产化管理——可持续发展的理想选择》, 66、31~34 页,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6。

12 朱启贵:《可持续发展评估》, 125、126 页,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

14 徐高岭:“市场是环境管理网链中的重要环节, 但不是独立的。”转引自郑易生、钱慧红:《深度忧患——当代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300 页, 北京,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8。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商学院经济研究所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 J)

(上接第 51 页) 技工作者同样创造价值, 其价值量大小也以其节省的简单劳动的多少来衡量。因为如果没有科技工作者, 社会要生产相同的产量就必须投入大得多的简单劳动。第五, 包括信息在内的知识同样具有价值, 因为它们同样可以节省简单劳动。具体地说, 如果不具备相应的知识或信息, 创造相同的使用价值必须使用更多的简单劳动。很明显, 之所以画一个圈只值 1 元, 而知道在哪里画圈值 9999 元, 就是因为知道在哪里画圈这一知识可以节省多倍的简单劳动。第六, 网络同样具有价值, 因为它也节省简单劳动, 其价值量也以其节省的简单劳动来衡量。具体地说, 如果没有网络, 人们要获取相应的知识或信息将需要更多的简单劳动。更进一步地, 电子商务的生命力及其产生原因都在于它能够节省简单劳动, 而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 那么电子商务的兴旺发达将是难以想象的。最后, 货币的电子化乃至数字化, 也根源于它对简单劳动的节省。显然, 人们因为使用电子化或数字化的货币而节省了大量简单劳动。而货币的使用权之所以被让渡给银行或基金, 是因为这样做能节省更多的简单劳动, 故这一让渡行为也应得到相应的补偿, 于是就有了利息。

综上所述, 消费者劳动价值论不仅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本意, 而且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更重要的是, 消费者劳动价值论不仅能够较好地回答新经济时代对劳动价值论所提出的新问题, 而且无损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整性。

注释:

雷达、于春海:《经济全球化影响的制度思考》, 载《世界经济》, 2000(4); 刘力、刘光溪:《经济金融化丛书》,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卫兴华:《关于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问题》, 载《经济学动态》, 2000(12)。

晏智杰:《古典经济学》, 375、382 页,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OECD, 1996: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Paris.

陈继勇、全毅:《美国知识经济的发展与启示》, 载《经济评论》, 2000(6)。

李罗力:《“新经济”价值理论初探》, 载《经济研究》, 2001(1)。

唐文进:《“新的价值理论”插翅难飞——与吴向红同志商榷》, 载《经济评论》, 2001(1)。

钱伯海:《社会劳动价值论》,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7。

李松龄:《劳动价值论: 市场经济运行的理论基石》,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9; 樊纲:《现代经济学三大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1。

10 11 14 晏智杰:《古典经济学》, 375、374、378 页,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2 马克思:《资本论》, 中文版, 第 1 卷, 52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13 马克思:《资本论》, 中文版, 第 3 卷, 209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15 温世仁:《新经济与中国》, 160 页, 北京, 三联书店, 2001。

(作者单位: 湖南大学金融学院 长沙 410079)

(责任编辑: N)